



学者、爱人与母亲

崔璨

和母亲说话,是我们彼此生活里最常见的场景。

话题有大有小,但态度总是颇为慎重甚至盛大的。小时候她给站在大红盆里的我洗澡,我们就谈爱与偶然。后来,我们在行山道上谈美人的样子,在晚安前谈我的男孩和她的恍然大悟,谈明天的菜谱,还有花园的下一个季节。

再后来,评改彼此的文章,成了我们话题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妈妈的许多文章,我都猛烈地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一些关于“怎么办”的段落,我就会要求她删去。我以为治学写文章,贯彻智识的快乐已经不错了,不一定非要落到入骨的答案里去,当然更多也是怕她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但她总坚持,学者最好能对世界多一些真实的关切和诚实的声音。

再比如,作为这个女人用餐饭和时间换来的“第一读者”,我会删去一些坦白的失色的话。很多人看到的她都是洒脱通透的,但她的初稿里,其实有一些少女初恋般的句子,会意外激动,会犹疑胆怯,会手足无措。

另一个我们常谈的话题是“生命”。我在帮妈妈整理她的长期策划——她要把自己的葬礼设计成一次展览。标题已经取好了,叫《再会了,宝贝儿》。听到荡漾的歌、可爱的句子,她都会叫我加入文件夹留作备用。这个展览目前计划分为三个章节,标题分别是:学者、爱人与母亲。

普遍而言,人生本是一

有一些方法论的。依照方法论可以省去一些思考、一些挣扎,但我的妈妈偏偏是个不用方法论的人。无论做学者、做爱人或者做母亲,她都似乎完美避开了明明人人都领受过的套路,偏要从头来过。她每次与我谈心,绝不用糊弄的语气或者毋庸置疑的姿态;对待感情,也总是赤子之心不设防备;这种理想化的持守,当然耗费耐心和青春,经历挫败与告别。一样作为女人,我有我的心疼,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无比鲜活,无比可爱的地方——一定许多人都与我一样,以某种身份与她相识,却终于发现她亦师亦友,进入她敞开的生命里。看似严格的身份边界,她用一以贯之的性情消解了。

如今,她继续以这样的性情,行走、写作,以此与更多人沟通,我知道这于她是必然。她是真拿爱人与母亲的态度在做学者的——她还是那位年轻的母亲,对生命有无尽的好奇和观察欲,忐忑、勇敢又心甘情愿;她依然是曾经天真诚挚的爱人,明知华现实的内里里有难堪的熬人,却对努力和意外抱有期待,仍旧一往情深……坦白讲,若不是这样的性情,学者、爱人与母亲,不也都是乏味的差事吗?

后来,我也读学位、写文章,也摸爬滚打着去做别人的爱人,期盼着以后成为谁的母亲。我和妈妈丰沛的谈话,有给我什么具体的指导吗?也许有一点儿。但更确定的,是这个坚持与我谈话的人给我的信心。她依然诚恳地说话,于是我相信那些真心诚意的过程,那些一再重返的人间烟火,相信岁月会赏赐给勤劳和渴慕的人美丽的皱纹……这种确信,甚至来自我们繁杂絮语中间,那些彼此安然倾听的沉默。

小辛到西藏、新疆转了几十天,带回来一本《喀什噶尔》,几斤重的摄影集,2003年的绝版。高台民居、大巴扎、艾提尕尔清真寺、赤红的山、挂满热瓦普的乐器店……每一张都燃起鲜亮的记忆!

小辛马上就要工作,早上了3年学,22岁硕士毕业,仍是6年前初见面的小女孩相。不过萌萌中还是有变化,讲起新疆,她连连感叹:雪山壮丽、沙漠无垠、绿洲丰茂、风情多彩……最后竟然说,在上海干两年金融,也许会到新疆去生活。看着她眼神里那无理性的认真,忽然想起英国大登山家马洛里。他一直梦想登上珠穆朗玛峰,1924年终于付诸行动,结果牺牲于归程。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如此投身于登山?他诗意满满地说:“因为山在那里。”人往往因为爱上一个地方而改变,人生所有的经纬线都汇聚远方,生命的弦发出不寻常的声响。

聊起最难忘的地方,我说是拉萨大

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常去常新。“新”可不是指城市更新的速度,欧洲这些城市大抵最难的就是改变样貌。对我来说,安特卫普是最熟悉的。

在国内参与“85 美术新潮”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时我已经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六年。在那个广告摄影还不成熟的年代,视觉传达和广告招贴设计很受学设计的学生们追捧。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来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恰逢轰动时装圈的“安特卫普六君子”毕业,整个城市充满了先锋与艺术交融的气息,直至今日,人们提起那个时候的安特卫普仍津津乐道。由教人美术转变为学习艺术,这种身份转换十分有趣。

在上海我已经在使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德罗奥,立体主义大师勃拉克还有抽象主义蒙德里安他们的绘画形式教学生画招贴画了。来到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后,学校浓烈的艺术氛围对我来说十分新鲜,各种新观念以及对新材料的运用刷新了我对于艺术表达的认知,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在这里,每个一心把艺术家作为职业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创作起来似乎没有边界,但充满新的观点。而对材料的运用也大胆自由,比如有些同学会自己收集矿物,研磨后调和出属于自己的颜料;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物件也能作为作品的一部分。

尼德兰作为油画的诞生地,在留学期间,我有幸将诸多古典油画都一览无

遗。以前只是听到过的鲁本斯故居、马格里特博物馆这类艺术圣地,更是吸引着我。有时,我会在下午三点去鲁本斯广场上晒太阳,坐一坐马格里特曾常坐的靠椅,试着体会下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如何偶然诞生的。同时,我也大量观看欧洲各地的当代艺术展览,经历当时的一些艺术事件,当这些优秀、充满观点的作品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在场感。

1995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当时看到的艺术作品、一同讨论过的同学、吸收的新观念乃至在安特卫普的生活方式,一直影响我至今。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安特卫普,这里的生活一切照旧,只不过我看这座城市的角度有了新的变化。中世纪就存在的咖啡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改变的只是客人们的话题;在鲁本斯曾经喜爱的餐厅里偶然拍下宛如他画中的女性;学校附近的酒吧一直是皇家艺术学校师生的聚会场所,“六君子”也常常在此出没,交流彼此意见,如同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样。

最近一次的安特卫普之行,我动了重游那家酒吧的念头,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居然有点遗忘了它的具体位置。一番来回寻找之后,我发现这家中世纪古堡改造的酒吧还是没变,美院学生们仍然伴着有力的爵士乐交换想法、迸发灵感;点上一杯啤酒,也和当年一个价钱,着实有种安心的归属感。

归途中我又有了做新作品的素材。

我眼中的安特卫普

倪志琪



初冬 (水彩画) 顾晋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印第安纳大学看一个夜场电影,结束时外面是彻底的夜,从校园影院到小屋的路没有灯,已经完全暗了。我们一路谈话,我和她提起一种说法:可能一个女儿活一辈子,最终无非活成母亲的样子——天上繁星闪耀,我俩走在一起,并不觉得害怕。

昭寺八廓街。三次到西藏,都曾坐在八廓街头看人来人往,长袍皮帽、绿簪金璜,转山般的人流,几无停歇。虔诚的藏胞,每次五体投地的长叩,都目光炯炯地望一望遥远,仿佛是天人之间的一次拥抱。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有时和歇息的藏胞闲谈,那古老的高原文明,融化在藏胞质朴的笑容中,给人温暖,让人敬重。

生命中总有个地方让人难眠,或在过去,或在当下,或在前方。无牵无挂是生活最沉重的状态,它失去流速,只有无形的下坠。和小辛说,10天后就要去新疆。她眼睛闪闪闪亮,说她在新疆的时候瓜果未熟,这回回去一定要给她带个大大的哈密瓜回来。当然要带啊,尽管背包里的单反和镜头很重,但这个瓜可不一样,它的瓢子里装着长长的梦……道别时,把《喀什噶尔》递给她,她有些惊奇,连忙放到我手里:“这是专门带回来给你的。”书很重,更重的是纯真的友情……

路过哈尔滨路嘉兴路路口的星梦剧院,门口挤满了举着偶像海报的少男少女。有业内人士普及知识点,此举曰“应援”,就是偶像团体的成员举起左手在剧院出口一字排开,和每位前来观看演出的粉丝击掌,每一次击掌说一次“辛苦啦,谢谢”。大庭广众下的“应援”仪式,自然让不少路人驻足停留,粉丝们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算疯魔一回,又如何。这个作为偶像团体演出基地的星梦剧院是一栋老建筑,上世纪30年代由英国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通和洋行设计,原名天堂大戏院,也曾是那个年代的追星圣地。

哈尔滨路东起海伦路,西至吴淞路,越过两条河流,交会三条道路,从头到尾只有三百多个门牌号。出版家赵家璧就住在哈尔滨路的258号,巧的很,就是星梦剧院的正对街。赵家璧的女儿赵修慧回忆,当年赵家璧白天在报社上班,心里却惦记着自己酷爱的文学编辑梦,晚上在自家屋里筹建晨光出版社。1946年11月,这个设在赵家客厅里的出版社,首先出版了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接着《志摩日记》《围城》等相继出版,名动一时。《围城》当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引发文坛争论,褒贬不一,但赵家璧看好它,决心出版《围城》。赵家璧此前并不认识钱锺书夫妇。《围城》书稿也是由作家陈西禾邀来给赵家璧的。据说赵家璧与钱锺书没有签出版合同,甚至没有互相谋面。初版《围城》在1947年5月与读者见面了,书上印着出版社地址:上海哈尔滨路258号,那年赵家璧39岁。赵家璧在编《围城》的时候,对面的天堂大戏院天天傍晚用高音喇叭播放《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乐曲,招徕路人入内欣赏最新的好莱坞电影。

想起网上看到的一个段子。白先勇请蔡康永帮着改编电影《滴仙记》。白先勇开始讲到了电影里需要用的昆曲《长生殿》的场面,索性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唱了两句,发觉他没有反应,停下来问:“噢?难道你不喜欢呀?”“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像个女人跷着小指头,咿咿呀呀的,不喜欢。”“唉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他对牛弹琴。“那你昆曲《游园惊梦》喜欢吧?”“也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唉呀呀!”白先勇连顿了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白先勇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唉呀!唉呀!唉呀!”白先勇把脚重重地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他拍着额头,喃喃自语。蔡康永说:“唐三藏目睹了我这个猪八戒,活活乱吞了他的人参果。”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到处是撩人的花边。不过,总还是有些人愿意不顾一切地为这个社会营造一些具有深度的文化旨趣,就像那些年在哈尔滨路上逐梦的赵家璧,和如今拍着额头的白先勇。



阅读街区

在哈尔滨路上逐梦的赵家璧

沈琦华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入了门。

袖子部分是服装裁剪重点,而袖子的结构原理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因此初学者都比较头疼。袖子根据其其与衣片的连接特征分为无袖、圆装袖、插肩袖、连袖。无袖,其袖笼弧线可以任意变化,但必须注意结构的合理性。圆装袖,是以人

一本改变命运的书

闵玉珍

体腋窝围线为基础而形成衣身和袖身的交界线的一类袖型,分一片袖、二片袖。插肩袖,是衣身的肩部与袖身连接为一体的袖型。连袖,是袖身与衣身或衣身的大部分连为一体的袖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能像模像样为家里大小孩做衣服了,虽然样子不一定漂亮,但至少是匀称合身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告别家人,带着破裁剪书,来到武汉汉正街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做起了学徒。裁缝工作相当辛苦,一般从早晨8点要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工作再忙,春节总要休息的,而我们做裁缝的越是逢年过节越是忙。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也成了师傅,其间看了许多裁剪书,也知道了那本破书叫《服装裁剪与缝纫轻松入门》。

时间来到了1985年,我也在汉正街上开了一家裁缝店,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裁缝,但爸妈及弟妹为了支援宝钢建设(我爸以前在十九冶工作),先后去了上海,想想自己孤身一人留在武汉也不是办法,也跟着他们去了上海。

来到了上海,我进了爸的单位宝钢冶金建设公司,正好他们单位搞三产,成立了协力公司,领导有意开家服装厂,解决职工的工作服问题,我成了最初5人的头。服装厂选址在月浦老街,我带着他们找场地、买设备、招工,在半年之内,成立了一家有50个人的中型服装厂,最初的阶段,我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从设计、制版、封样、裁剪、缝绗、熨烫、打包、出厂,样样都要管,一年之后,服装厂才走上正轨,我也成了服装厂厂长。之后服装厂扩大规模,成了飞时制衣有限公司,我成了总经理。

2015年光荣退休,过起了含饴弄孙的生活,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从2000-2017年,搬了三次家,东西扔了不少,但那本陪伴了我一生的《服装裁剪与缝纫轻松入门》始终舍不得扔掉,每每看到它,就勾起我许多的联想。

十回谈

在《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帮助下,我们陆续考上了大学。

责编:祝鸣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